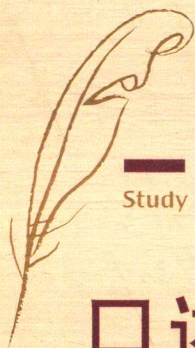


上海交通大学
现代传记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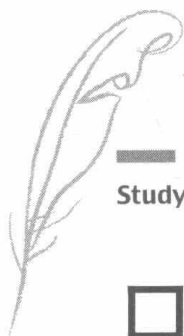


王军 著

Study of Oral History

口述历史研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 军 著

Study of Oral History

口述历史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述历史研究 / 王军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 - 7 - 5598 - 1340 - 4

I. ①口… II. ①王… III. ①口述历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573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策 划: 魏 东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65200318 021 - 31260822 - 898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90 × 960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190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序

杨正润

读着王军这部《口述历史研究》，如见故人，一种亲切感油然而起，书稿中的一些观点和例证，使我回想起当年同王军讨论它们时的情景。最清晰的记忆是那年我给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生开设一门“《哈姆莱特》导读”课，王军和其他两位博士生也去听课，整整一学期里每周有一个晚上，我们乘校车来到江北校区，在校园旁的小餐馆里共进简单的晚餐，然后去上课；两节课结束了，我们在晚风和星光下穿过宁静的校园。在餐桌、在林荫路上，我们海阔天空聊起各种话题，谈莎士比亚，也谈口述历史——那时王军正在做这个题目的博士论文。那真是值得留恋的时光：轻松又充实，丰富而快乐。

这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对口述历史的研究，伴随着王军的青春岁月。从硕士论文开始，其后是博士论文，毕业后是国家教育部基金项目，王军都是做这个题目，这里有辛劳和成绩，有喜悦和满足，也包含着某些

遗憾,种种甘苦当然只有王军自己最清楚,不过,看着这近二十万字的书稿和长长的文献书目,我禁不住要说:这里是王军的学术炼狱,他在其中成长和成熟。

在列入广义传记(life writing)的各种文类中,口述历史是年轻而又纷繁复杂的一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口述历史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成立,迄今已经七十年。作为一种文本的生成方式,即口述者自我叙事并由记录者借助录音设备记录和整理完成,口述历史已经风行世界,成为传记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近三十年来各种口述历史的机构和组织相继出现,涌现大量作品,军政要员、文化名流、商场精英,也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甚至草根群众,都在做口述历史。一些学者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传记的时代。这似乎正在被历史所验证,口述历史则在其中独树一帜,鲜明地高扬。

旺盛的生机常常伴随着年少的幼稚,口述历史虽然不断出现佳作,但无论其实践还是理论,都显然有待完善。举例说,唐德刚被公认是华人或中国口述历史的第一人,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1957年正式成立“中国项目”,唐德刚就在其中承担了中国现代史上几位名人李宗仁、胡适和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但这三种同属哥大口述历史的成果,同样由唐德刚完成,中文版却有三种不同的名称:《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张学良口述历史》,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们分别取名“回忆录”“口述自传”和“口述历史”,这三者有何区别?

在这三部著作中,唐德刚的责职也有不同的界定:《李宗仁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历史》是唐德刚“撰写”或“撰述”;《胡适口述自传》则是唐德刚“译注”,也有版本把唐德刚标明为此书的“作者”;还有出版社把

这三部作品都收入“唐德刚作品集”。唐德刚博士是一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些作品中的责任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表述?这正好证明,在口述历史中,口述者同记录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可能因人、因写作目标或情境而异,其中涉及复杂的理论问题。

同唐德刚有关的这两个问题,王军都进行了讨论,当然这部著作的论题远不止于此,王军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作为传记和自传的现代形式的口述历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具有历史视野,他把口述历史放在东西方三千余年的传记发展史中进行研究,也广泛参考了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历史、记忆、身份、对话……这些传记研究中的传统话语,被他引入口述历史的范畴而阐发出新的意义。

王军在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即展翼东南,任教于泉州华侨大学。虽然关山阻隔,我们却常见面,他参加了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主持的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并作出了重要贡献。让我同样欣慰的是,他在华侨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讲授《哈姆莱特》和莎士比亚戏剧,颇得学生欢迎。我这些年来,主要是研究传记与莎士比亚,王军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并且取得好成绩。他是我的最后一个学生,谢谢他,使我的教学生涯留下一个圆满的回忆。

2018年6月,于秦淮河畔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何为口述历史	1
第二节 从聆听到对话	12
第三节 英美研究现状	19
第四节 国内研究现状	37
 第一章 动机与操作	51
第一节 历史与历史学家	51
第二节 寻求史实的口述历史	59
第三节 口述历史与自传	68
第四节 可操作的口述历史	79
第五节 操作的价值	98

第二章 求真之险途	113
第一节 语言、知识、情感、情绪	114
第二节 记忆与自我身份认证	133
第三节 现在与过去	150
第三章 对话与人格	171
第一节 历史与传记：独语抑或对话	172
第二节 口述历史中的对话	184
第三节 口述与关系	210
第四节 参与者的形象	226
结 语	263
参考文献	267
专著部分	267
论文部分	280
致 谢	283

导 论

第一节 何为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以访寻史实为目的,以采访者与讲述者的访谈录音为基础修改而来的纸质文本,简称口述史。早期的口述历史多以名人为讲述者,形态上接近标准自传,故国内外学者也称之为口述自传。本书在不产生混淆的情况下把口述历史与口述自传视为一种文体。

口述历史出现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彼时恰逢“二战”结束,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整理材料、反思历史。“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趁着同这段历史有关的重要人物大都还在世,应当请他们把自己的有关经历记载下来,给后人留下翔实的、第一手的资料;但是,他们可能健康不佳,可能事务繁忙,或是缺乏写作经验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亲自写作回忆录有许多困难,于是这些美国学者就提出一个办法:请他们口授,利用已

经普及的录音技术聘用专人给他们记录和整理。这一项目的创始人是美国著名史学家艾伦·尼文斯教授(Allan Nevins, 1890—1971),他给这种传记形式起了一个现代名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①在尼文斯的推动下,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The Columbia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成立,这标志着口述历史的正式出现。该学部首次大规模地在访史活动中应用录音机,使之区别于古代的口头访史行为,并建立了一整套详细的操作规范,推动了口述历史的迅猛发展。

以口头访谈作为访求史实的途径,古已有之。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曾寻访故老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报任安书》)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传矣”。^②《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③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太史公曰”中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且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④司马迁在此使用的口述史料,起到了补充、佐证的作用。他在《孟尝君列传》中使用口述材料,是验证世人关于孟尝君好客自喜的事实;在《魏公子列传》中使用口述史料,则是反驳世人关于荆轲刺秦王的一些流言。这些口述材料依附于已有主题,均不能独立成篇,而由于语言“不雅训”^⑤,必须

①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3—434页。

② 司马迁著,韩兆琦评注:《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100页。

③ 同上,第1106页。

④ 同上,第1218页。

⑤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太史公曰”部分中写道:“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尤雅者。”

经过甄选才能部分留存。也就是说,在司马迁那里,口述材料从本质上是倾向于消失的,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见证或者佐证。因此,真实性成为衡量口述史料价值的关键,真实性有问题的口述史料基本没有价值。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部分是根据我自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查过的,然而即使费尽心力,真情实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① 司马迁和修昔底德的甄别工作表明,口述未必准确,而且口述服从、服务于史料收集工作,最终体现为历史典籍中的一段文字。而选择口述放弃史实,口述很可能会变身为神话传说,发展成《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作品。兰克学派^②的做法则是放弃口述,因为后者经常与真实有着差距。

口述史学家唐德刚^③曾认为司马迁与修昔底德使用的是“口述史料”,并把《史记·刺客列传》看作口述历史。^④ 同理,他也认为荷马与希

① Thucydides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The Penguin Group, 1972, p. 48.

② 兰克(Leopoldo von Ranke, 1795—1886)是十九世纪史学大师,主要著作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教皇史》《法国史》《英国史》《世界史》等。他的名言是“事实是怎样就怎样叙述”,主张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治史方法。有人批评他说,“兰克走过历史舞台,就像走过画廊一样,一边走一边敏捷地记笔记”。兰克的观点经由他的著作和学生得到宣扬,形成了影响极大的兰克学派。兰克学派对中国新史学有过重要影响。

③ 唐德刚(1920—2009),美籍华人学者。1939年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59年获史学博士。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图书馆馆长,曾负责口述历史计划中国部分,期间参与《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口述史作品的采访、撰写,并撰有《晚清七十年》等史学著作。

④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见唐德刚:《史学与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罗多德的作品都是“口述历史”。唐德刚是口述历史的早期参与者之一，他的这种追本溯源是为新生的口述历史作鼓吹、宣传。在口述历史不流行、还需要推广的年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必然会带来混淆：如果《史记·刺客列传》是口述历史，那么《马可·波罗游记》和《李秀成自述》是不是呢？

《马可·波罗游记》所讲述的富庶、文明和奇异的东方为西方人所未见，被认为荒诞不经，甚至他的朋友在其临终之前劝他收回或修改游记中的记载。该书对扬州、高邮、镇江、宝应、南京、杭州等城市的描述流于浮面且多有雷同之语，“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臣属大汗、待工商为活”^①成为其对各个城市进行介绍时最常用的描述语。在谈及福州时更指当地人“凡肉皆食，甚至人肉亦极愿食之，惟须其非病死者之肉耳”，并说“此辈寻觅被害者之尸而食其肉，颇以为美”。^②按照该书记载，福州人竟然四处寻觅并食用死人尸体。此种描述在令人倍感毛骨悚然之余，也不禁质疑其所述之动机是否是制造轰动信息。在其对刺桐（即今日之泉州）的描述中曾提到“此迪云州城，特有一种语言”。^③按，迪云州即今日泉州市下属之德化县，德化县的确使用不同于一般通用语言的闽南话。闽南话与当时通用的官话以及今日之普通话差别较大，但在整个泉州都使用闽南话的情况下，单独指出德化县使用此种语言，令人难以理解其思路：在泉州就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何要到泉州下属的德化县才发现呢？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对泉州的描述与对德化的描述来自不同的信息源，而非亲身经历，在后期叙述、撰写中未能调整好文章语句，也就是说，

① 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32页。

② 同上，第367页。

③ 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第373页。

他本人可能未到泉州(德化),只是参考、转写他人的记载——尤其是考虑到他没有在该部分提及泉州茶叶。

无论马可·波罗所言之事,还是其言之凿凿的逻辑,均属匪夷所思。而行文中较少出现其本人所做之事,很难让人相信其本人到过其所述之地。也有研究表明,虽然不乏夸张、不实的成分,游记中所述部分内容大致与元史相吻合,而且马可·波罗本人确实来过中国。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在《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一文中对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行迹有翔实的考证。国内外对与马可·波罗有关的问题多有争议,可参见南开大学杨志玖教授的文章《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

《李秀成自述》同样因为真实性无法确证而成为一个历史悬案。一旦按照唐德刚的意见,把上述二者与《荷马史诗》看作口述历史,那么,起初依赖口口相传最后整理成书的《论语》《三国演义》难道也可以被认为是口述历史?唐德刚的态度必然造成口述历史外延的扩大化,造成混淆。而确定无疑的一点是,《胡适口述自传》与《荷马史诗》完全是两类作品。前者建立在事实对话的基础上,后者的产生、传播过程则难以考详;前者有录音为证,后者只有文字流传;前者重事实,后者则是标准文学作品,偏想象。虽然《论语》并非真正意义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也部分地基于历史事实,并具有一定的文献功能,但是它们并不能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因此都不是口述历史。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

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雍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①

由于《论语》不是一时一地所作,而是由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经多次编纂而成,传至汉朝,即出现了版本与真伪的问题,其文献价值有待商榷。杨伯峻在《论语译注》的“导言”部分说,“如果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不应该依据左传来怀疑论语”。^②但是他也承认,书中可能有不真实之处,虽然“顶多只是说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③

而在现代口述史中,由于有录音录像为佐证,一般不会出现对作品真伪的争议,最多是对讲述内容真伪的讨论。而且负责任的采访者会通过许多方法来保证讲述内容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比如,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张发奎口述自传》是采访者在与讲述者张发奎四百余次录音谈话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人的佐证材料完成的。在历次采访前,采访者甚至早已阅读了张发奎的日记、信函与公文,做好了精心准备。面对讲述者闪烁其词或语焉不详之处,采访者可以加以引导或者订正。

当然,也有一些采访者出于对讲述者的敬重或者因沟通问题而未能发现、纠正讲述者有意无意说出的虚假信息。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文强宣称曾在经过厦门时候亲见毛泽东,并做了有声有色的描述。依其所

① 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61页。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31页。

③ 同上。

述,二人见面时间当在1925年5—8月间。而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于1925年9月“由长沙动身赴广州,路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然后到广东韶关,再转乘火车抵广州”。^①可见,文强与毛泽东二人是不可能在这次会面的。此次会面因此完全出自文强的杜撰,并不真实。这种杜撰不同于《论语》的编纂过程。前者目的性明确,就是由文强这位历史人物讲述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虽然文强借机自我粉饰、伪造事实;后者则是中国“第一部用当时白话写的生动的言行录”^②,而“言行录写作的目的一般都是进行一种道德教诲或提供思想和见解,没有人物完整的生平”^③。两部书截然不同。

《三国演义》的情况相对比较简单。虽然它本于《三国志》,但很难把它与历史资料等而视之。其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均受到了宋元之际世俗文化兴起的影响以及正统思想的改造,似史非史。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有涉及:

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〇)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五杂俎》十五)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丙辰札记》)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至于写人,亦颇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

② 胡适:《传记文学》,《胡适讲演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③ 《现代传记学》,第243页。

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①

《论语》《三国演义》在成书的过程中的确有谈话、口头相传的成分,但这并不能保证它们成为口述史作品。相反,前者是言行录,后者是历史演义性质的文学作品,均明显区分于《胡适口述自传》以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口述历史部分。

可见,给口述历史一个明晰的定义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确定口述历史的定义,才能避免出现把《论语》《荷马史诗》等误作口述历史的情况。

目前,它的定义有很多种,彼此或有很大分歧,主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自1948年以来使用现代录音设备采录访谈、然后整理成书的新形式。《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认定口述历史必须是“磁带录音保留的材料或者以此为依据的纸质文本”(tape-recorded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interviews concern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②英国口述历史学会(The Oral History Society)也主张口述历史必须建立在录音/录像磁带(recording equipment)的基础上。^③国内学者钟少华认同这种观点:“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④广义的定义则或者追溯至使用了口述、对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136页。

② <http://student.britannica.com/dictionary?va=oral%20history&query=oral%20history>,访问于2009年5月5日。

③ <http://www.ohs.org.uk/advice/index.php>,访问于2009年5月5日。

④ 钟少华:《中国口述史漫谈》,《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第46页。

话收集资料的史学方法,或者把与史实无关的口头讲述、新闻访谈也纳入其中。美国口述历史协会(Th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采访、记录(recorded interview)往昔事件、生活的当事人来收集和保存历史信息的方法。它既是最古老的历史调查方式,远早于手写的文字,同时又是最现代的一种,伴随着磁带录音机的应用在1940年代出现”^①,即是一例。维基(Wiki)百科的定义也宽泛得多,认为凡“基于讲述者个人经历及观点,对历史信息的记录、保存及解释”(recording, preser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opinions of the speaker)^②都是口述历史。国内学者杨立文支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符合“亲身经历”“亲见”“亲闻”三点的就可以划入口述历史的范围。^③

可见,目前学术界在定义上的纠纷基本集中于一点:是否使用录音机。是否使用录音机不仅可以区分古代形式与现代形式,同时也限定了其具体的访谈形式,并最终决定了口述历史区分于古代访谈类作品的特质。

口述如果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必定需要借助其他形式才能得以留存,在转变过程中,必然会丧失口述(对话)的性质。《论语》《李秀成自述》《三国演义》《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它们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可信度,并成为与口述或者对话关系不大的另一种文体。这种情况在录音机应用到口述中以后发生了变化。口述场景固定在录音录像磁带上,即使其内容的真实性存在争议,在凭借录音录像

① <http://www.dickinson.edu/oha/>,访问于2006年4月3日。

② <http://www.answers.com/oral+history&r=67>,访问于2009年3月6日。

③ 杨立文:《口述历史刍议》,《纵横》2002年第8期,第1页。